

反思學術評鑑與學術生產： 以經濟學學門為例

瞿宛文*

近十多年來，台灣人文社會學科的評鑑方式與標準經歷了相當大的變革，以 SSCI 作為領導指標幾乎已經成為學界主流的共識，此變革對研究成果的影響也已經逐步呈現，該是時候來檢討評估一下這些評鑑標準及影響了。

學術評鑑的目的應該是為了促進學術的發展，提高學術生產的品質。作為一個後進國家，我們感到既有的學術傳統不足以幫助我們現代化，因此要向西方學習。舊有的既然不足，同時既有的成規也顯得封閉迂腐，常有門派與自我繁殖的現象。因此在早期，引進西方的學術與學術規範是很必要的作法。不過，在現今台灣，和西方接軌可說已初步完成，我們應該對目前的情形作一檢討。

學術生產的目的，必然要支持在地社會的需求，同時，也應能夠和國際學術社區進行交流，進而對全球文化做出貢獻。對於這些目的我們做到了多少？

一、評鑑標準的意涵

在評估成果之前，我們應該先要檢討目前學術評鑑的準則，探究其中所隱含的價值與目的為何。目前，除了同儕審查之外，數量標準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wwchu@gate.sinica.edu.tw。

以及 SSCI 的標準（或應說被 SSCI 收錄與否）越來越被採用。譬如，台大校長在 2003 年的募款信函中，對該校教師研究成果的描述，主要是用當年內教師們所發表的 SCI 以及 SSCI 的論文篇數來表達。確實，SCI/SSCI 論文篇數已成為大學及研究機構的校院所各層級自我評估必備的部分。雖然在理工科部分，除了 SCI 收錄的論文篇數之外，也開始注重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但在人文社會學科則因條件缺乏而很少採用影響指數，而只計算收錄於 SSCI 論文篇數。

台灣的人文社會學科，以被 SSCI 收錄的論文篇數來衡量研究成果，這其中所強調的價值，主要是「參與國際學術生產圈的能力」。照理說 SSCI 只是各種資料庫之一種，將被其收錄與否視為一種品質的標準，雖說有些荒謬，但也是後進國家常有的行爲。不過，在此暫不論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在此要強調的是，這標準所著重的是「參與國際的能力」。

在早期，既然我們同意要向西方取經，同意國際學術水準高於國內，則具有參與國際生產的能力，顯然是一種能力的提升。但問題是「能力」的提升不應該是我們終極或唯一的目標，我們最終的目標應該是學術上的貢獻本身！

很顯然，這標準並不重視「服務在地社會需要」這功能目的。或許有人會認為這目的也可以在如 SSCI 國際刊物中實現，但在現實情況下，這是不容易做到的。因為無可避免的，國際期刊所關切的問題，它們的問題意識，是由歐美（更精確些是美國）學術圈所主導，這其中雖有其普世的意義，但是不必然和台灣或任何其他地區的立即關切有太密切的重疊。不過，我們這裡所提的「服務在地社會需要」，是指廣義的社會整體發展的需要，當然不是指狹義的服務特定利益的需要。

再則，就長期來看，如果我們學術圈要能夠在國際學術社群中做出特殊的貢獻，我們的「利基」必然會是和我們自身經驗有關的研究，將我們社會獨特的經驗，以先進的、能夠與國際社會溝通的理論

語言，將我們的成果呈現，進而對世界做出貢獻。我們的「利基」應該不是在於追隨歐美的問題意識，對於他們問題之研究，我們為什麼會比他們作的好？

這也牽涉到後進國家稀少資源配置的問題。後進國家的高等研究人力必然是稀少資源，這資源若用來研究本身的經驗，應比較符合在地社會的需要，或說（對社會而言）投資報酬率比較高。不過，在我們學術界的運作機制中，「服務在地社會需要」並沒有成爲一個重要的目的，因此在建立評鑑標準過程中，並沒有被嚴肅地對待。

反而，比較被重視的目標是：現代化、趕上西方。原先，這主要是後進國家要追趕西方、要求現代化的要求，近來則是要求「在全球化之下有競爭力」。因此，隨之而來的目標是，大學教學用英語、吸引外籍生，教育做爲商品要在全球市場競爭。若要考慮台灣教育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就必須考量我們的「比較利益」爲何？這和我們自身要做好全球化準備是兩回事。譬如說，我們的比較利益可能在中文，但不表示我們不需要英語能力以參與全球化。

以台灣目前的發展階段而言，要將我們的高等教育變成爲有全球競爭力的「外銷」商品，是否是一個值得努力的、可行的目標？這問題尚未開始討論，就已經在怕落伍的心理下被採用爲具體目標了。事實上，做爲後進國家，在教育上確實要考量如何使自己國民具有全球化競爭的能力，但這與將教育變成具全球市場競爭力的商品，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要在全球教育市場上有競爭力，或者是以價格低廉取勝，或者是以特色取勝，我們的利基何在？沒有利基，就靠給獎學金吸引學生，只能算是作外交，談不上「有競爭力」！其實，至今爲止，自費來台的外籍生以學中文爲絕大多數。就人文社會學科而言，會吸引外國學者來訪問交流的領域，主要是中文、漢學、以及東亞經驗研究。而就東亞自身經驗研究的成果而言，我們成果極有限，談不上有競爭力。在此情況下，要求台灣的大學教學用英語、吸引外籍生，以此在全球

市場競爭，只能說是錯誤的市場定位。

其實，這其中牽涉到一弔詭的關係。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如果只是一味的跟隨西方領導者，並不能帶來競爭力。反而是必須建立自身特色，自身的主體性，才能掌握利基、建立競爭力，要做到這目標，我們必須要面向世界的在地化才行。

二、以台灣經濟學門為例： 個別參與國際分工、以期刊地位為表現標準

經濟學在台灣的社会科學學門中發展較早，留美博士數目最多，可以說是向西方學習成果最好的一門社會學科。如果以刊登於 SSCI 資料庫的論文篇數計算，那經濟學門也絕對領先台灣其他社科學門。

同時，經濟學門的共識程度也最高，多數人都接受 EconLit/SSCI 相對於本土刊物的優越性，並且早已進一步發展期刊的等級區分，十年前就已開始不定期對經濟國際期刊作分等排比¹，分等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建立數量化的評鑑標準。學界領導單位中研院經濟所本身，也在十年前開始建立國際經濟期刊分等名單，並據此來計算點數，作為研究人員升等續聘的依據²。在學界之中，公認的表現最高標準，即是在國際最好的幾個經濟期刊發表文章³。大家互相很少會問「你在作什麼研究」，但是會問「你升等點數夠了沒」，更會傳頌某人在某頂級國際期刊發表了一篇論文（不管內容是什麼、貢獻是什麼）。

若參考國科會委託經濟學門所做的學術單位表現評估報告⁴，我們會發現即使在這比較先進的社會科學學門中，以英文在國際期刊發

1. 許松根（1994，1999）。目前（2004年）國科會也有一委託計畫在進行，再次對國際經濟期刊作分等。

2. 在中研院經濟所此份期刊分等名單中，台灣本土前三名的經濟期刊（收入於 TSSCI 中者），則被列在「頗具水準」類（次於傑出與優良類別，排第三等）。

3. 可參見巫和懋（2001），文中作者在評估台灣學者在經濟學界的成就時，所採用的標準，就是在國際前七大經濟期刊刊登的論文數目。

4. 曹添旺、賴景昌、張峰嘉（2002）。

表，還是極少數人參與的事情。這評估報告主要是要評比各經濟學術單位的研究表現。被評比的共有 22 個經濟學術單位，其中有 315 位專任人員，在 1995 到 2000 年間，他們發表論文之中被收錄於國際經濟學資料庫 EconLit（排除台灣本土兩本刊物後）的總篇數為 228.65 篇⁵。而這些篇數高度集中，排序前五名的學術單位所發表的被收錄的論文數佔全體總篇數的 71.3 %⁶。

上述是對學術單位表現的評估。若進一步看人員的分佈，更會發現在國際期刊發表是集中於為數不多的一些人。譬如，若以 2000 年為例，發表此種 EconLit 收錄論文的人數為 32 人，占當年這 22 個學術單位總員額數 7.43 %，共發表 29 篇上述論文⁷。

如上述，台灣經濟學界認為能在最頂級的國際經濟期刊發表論文，是最高的表現。那就這標準來評估，台灣學界的成績如何？根據巫和懋（2001）的統計，若只看國際前七大經濟期刊，則台灣學者發表的篇數並不多，從 1981 年起至 1985 年為 2 篇，1986 年至 1990 年為 5 篇，1991 年至 1995 年為 4 篇，1996 年至 2000 年為 4 篇，亦即這 20 年間在七大期刊發表的論文總篇數為 15 篇，且似未有顯著上升的趨勢。若以在頂級刊物發表代表參與經濟學領域的主流發展，那台灣經濟學界「尚難影響國際學術主流」⁸。

這表示依據 EconLit 以及國際期刊分等級的評鑑標準，實際上只涵蓋到約一兩成的學者，雖說這評鑑標準的影響當然是全面的。台灣絕大多數的經濟學者的主要發表園地，不是上述的被 EconLit 收錄的非本土刊物，而是台灣發行的本土刊物。這部分成果的評鑑在實質上，則主要依據論文是否刊登於 TSSCI 為標準，這是數量化評鑑標準

5. 合著的論文數目以除以作者數來計算。中研院經濟所的《經濟論文》，以及台大經濟系的《台灣經濟論叢》，已被收錄於 EconLit 資料庫。

6. 曹添旺、賴景昌、張峰嘉（2002：表 2-2）。

7. 曹添旺、賴景昌、張峰嘉（2002：表 1-2）。

8. 巫和懋（2001）。他文中的七大期刊是指 AER, JPE, QJE, RES, RE&S, Econometrica, EJ.

的第二層次，而這部分成果的評估，則因 TSSCI 資料庫尚未建置完成而未納入上述評估報告中。

其實，台灣經濟學者也對台灣經濟問題進行不少實證研究。如果以 2002 年底經濟學會年會中所提論文來看，約超過三分之一是理論模型式論文，近三分之二是有實證內容的論文，比例並不算少。但是，如果以台灣經濟學者刊登於國際期刊的論文來看，則是以理論模型式的非實證性論文為主。

因此，與台灣有關的實證論文並不在少數，且多在本土刊物（主要以中文）發表。但學界整體的成果與特色何在？更重要的問題或許在於，實證論文中的「問題意識」沒有特色，其問題意識多為追隨美國經濟學界，以效率檢驗為主題者佔絕大多數，而不重視動態成長以及結構變遷的問題，至於以政策關懷為出發點的相關研究則更在少數。也就是說，研究者多將台灣當作為已開發國家來對待，所有的問題都放在和美國等同的框架中衡量，並且不將問題當作是「經濟發展」的問題⁹。確實，不論是用中文還是英文寫作，我們都在追隨美國經濟學界的「偏好」，而經濟發展以及經濟史就都成了不受重視的邊緣領域了。

要如何來衡量台灣經濟學界的成果？這當然很不容易評估，不過，如果用影響指數來看，或依上述在頂級期刊發表的情況來看，或依一般觀察，恐怕都不會認為台灣經濟學界整體在國際學界有太大影響力。不過對一後進國家而言，這也並不意外。

如果從建立特色、利用自身利基來看，則台灣經濟學界的成績並不好。國際間對東亞經濟發展興趣甚高，無論是對相關經濟理論的檢驗，或是可參照的經濟政策，都是台灣經濟學界可以從台灣自身發展經驗進行研究做出貢獻之處，但我們在這方面做的很少。

9. 依據國科會（1996），在 1991-95 年間，國科會經濟學門各研究領域經費使用分配之中，經濟發展領域只佔了 4%。

再從「服務本土社會需要」的角度來看，則台灣經濟學界的成績也不能算好。譬如，若我們回顧一下，台灣近十多年來，發生諸多重大結構變革，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國內市場自由化、全球化、兩岸關係日漸密切、財稅危機、民主化之影響等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議題，有現實意義也有理論與政策意涵，但是我們經濟學界整體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很少，主要的資料累積工作多由智庫進行，而其學術衍生意義則多尚待開發。

劉遵義院士在多年前，曾於中研院經濟所發表演講，題目為“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a World-Class Economics Capabil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抒發了他對台灣經濟學界尤其是中研院經濟所的期許。他認為台灣優異突出的經濟發展成績不單值得研究，台灣學者的比較利益也正是在此相關領域，同時應該進行跨國比較研究，從中推演出普遍性的理論意涵，藉此來建立世界級的經濟研究與在地特色。他建議長期計畫成立一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具體步驟包括建立資料庫，策略性選定發展領域，集中有限資源於這些領域，策略性培育相關人力，長期投資等步驟。他強調著重研究經濟發展領域是台灣的比較利益，是建立世界級研究的捷徑，這樣做對國外有吸引力而且對國內有交代。

至今在多年以後，如果對台灣經濟學界的成績作一評估，很清楚我們並未遵循劉院士所指出的道路。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學界的主流共識並不認同劉院士所提出的視野、價值與願景，劉院士所認定的台灣經濟學界的比較利益，並未引起共鳴。在整個經濟學界的發展環境中，對於劉院士所期待的那種學術工作，並未受到鼓勵。

總之，我們台灣經濟學界所走的道路，是個別人員各自參與世界分工的路徑，然後以各自在 EconLit/SSCI 發表的成績加總作為我們的成果，同時這成績的標準著重在論文刊登的期刊之地位以及論文篇數。這是我們學界的主流共識，因此幾乎所有的誘因獎懲機制，都是

奠基於此標準上。

這路徑的成效如何？是我們有限資源最好的利用？上述其他的標準與目標，包括建立特色、利用自身利基、建立主體性、服務本土社會需要等，是否也是值得追求的目標？至少，我們應該要開始對這問題進行討論評估。

三、多種工作、多種標準

如上述，在台灣經濟學界中，只有少數人會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也就是說，以EconLit/SSCI為標準的獎勵只會適用於少數人。其實，在美國經濟學界，頂級期刊的論文作者也呈現高度集中的現象。如今在台灣經濟學界，EconLit/SSCI幾乎成為唯一的最高標準，這不單意味著其他占多數的學者，他們的成果被認為價值較低，同時，這獎懲體制對於這些其他多數學者只給予負面的訊息（不能上EconLit/SSCI不能得獎），而不能提供正面的誘因，來鼓勵他們進行其他有意義的工作。

事實上，在經濟學界中還有許多不同的研究工作。包括費時費力的資料收集與整理，資料庫的長期維持，除了量化資料外，國內以及國際上相關的制度變遷，歷史性的分析，經濟政策的研究等，這些工作都很必要，皆有其價值，或說和能夠上EconLit/SSCI的研究工作有不同的價值。雖說目前被認為最理想的情況，會是研究者自行進行資料收集與整理，然後進行嚴謹分析將研究成果刊登於國際期刊。但是，國際期刊自有他們各自的關切議題，台灣本土研究成果能夠登上EconLit/SSCI數目的稀少，就見證了其中的困難度。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體制下，如果沒有做到最後那一步（登上EconLit/SSCI），前面的研究工作就被認為沒有價值，對於上述這些其他工作其實沒有提供誘因。

因此，在目前的制度中，評鑑標準應該要變得複雜化多元化，獎勵也可多元化，讓不在EconLit/SSCI發表的、占多數的學者，若進行

上述這些其他工作時，也可以受到制度上的鼓勵。

同時，不同單位應有不同的定位與任務。其他國家多半會區分研究大學與教學大學，職業教育也應有其位置。要求所有的大專院校都要作研究，都要算得出 SCI/SSCI 的論文篇數，只會帶來無謂的壓力與資源的錯置，而忽略了更重要更基本的教學任務，實在是非常錯誤的制度設計。

依據客觀條件以及理想願景，對自身做出合理適當的定位，是制度設計的基本功課，然後評鑑標準之設定隨之。這制度設計的邏輯，適用於台灣學術生產在全球學界的定位，適用於台灣內部不同高教及學術單位的各自定位，適用於台灣不同研究學者的各自定位。確定的是，目前的以 SSCI 的單一標準適用一切情況，是錯誤的設計，不符合上述制度設計的理性邏輯，必須作更張。

四、後進國家學術生產的問題

學術生產主要是由國內資源來支持，但它運作規則不同於一般商品生產。就商品生產而言，全球化意味著參與國際分工，譬如，台灣要生產什麼樣的電腦，則取決於國外顧客的購買需求，檢驗準則非常具體現實。學術生產不同於商品生產，雖說是整個社會在支持著學術活動，但是生產的效益並不是直接由顧客（在地社會）的市場購買行為來檢驗，除了國家的干預主導之外，主要是由學術社群自行決定，決定標準、如何評鑑、如何獎懲、如何分配資源。

就人文社會科學而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後進國家的影響，主要在三方面顯現，一方面國家更講求所謂的國際競爭力，因而加強要求學術生產對經濟競爭力的貢獻，加強要求效益。另一方面，自由市場的邏輯也日益深入人心，主事者皆認為要用獎懲結構做誘因，設立清楚評鑑標準，依據效益評估結果分配資源定奪升遷，同時，在競爭之下，評鑑頻率不斷提高，好似多做評鑑就會帶來進步。

第三，更重要的是學術社群在全球化風潮之下，援用所謂「全球

化」的標準來作為學術評鑑的準則。既然最好用清楚的、量化的標準以便經常評鑑，因此國外（美國）現成資料庫的收錄紀錄（如SSCI等）竟然就成了現成的、極有用的標準。

在此要指出的是，若繼續與商品生產作對比，學術生產的全球化，並非源於美國市場「需要」台灣學術市場的廉價勞動，而是由於台灣學術社群的競爭型態所導致的結果。

在美國／西方的知識霸權籠罩下，「由西方眼中看自己」、「爭取西方肯定」這動機因素常會在後進國家帶來扭曲性的後果。若對歐美學術風潮的起落發展稍作瞭解，就可知道這些學問是在地學術社群因時因地、以及當時他們的競爭條件而發展出來，除了其必然會受到歷史社會條件的限制之外，每個學科社群難免會有隔離封閉性，必須不斷受到外界的挑戰以及自身定期的反省，才能維持學科健康的發展。再則，人文社會科學並無法獨立於意識形態，不可能達到所謂的完全科學。由美國絕對主導的國際經濟學界，或因自視科學性較高，因此是社會科學中少數沒有進行過自我反省的學科，不過近年來法國、英國劍橋以及哈佛等校經濟系之研究生，紛紛陸續發表宣言，要求經濟學界對教學進行改革，要求逃離想像的世界、廣納多元取向、與現實連結、並反對不知節制運用數理模型。主流經濟學雖向全球宣揚自由市場，但各校研究生一致指責現今經濟學已為單一取向所壟斷，實不足為外人道也¹⁰。後進國在向美國取經之際，照理應注意這些問題，而非盲目追隨。

不過後進國家為了「追趕」，就常顧不得這些較細緻、較真實的問題，只顧著要確定「先進標準」，然後忙著「趕上」，「趕上」後就有了像考完試般的輕鬆感（答好了西方老師出的考卷）。後進國家學者多忙著趕上，比較不易對西方學問採取較具批判反省的態度，尤其這二十多年來，西方經濟學界流行新自由主義自由市場學派，其意識

10. 可參見Post-Autistic Economics Network, <http://www.paecon.net/>.

形態意味甚為濃厚，不幸常導致後進者容易對自由市場教條投入太多的信仰。

總之，後進國家如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全球化現象，並不是一種「國際分工」，而是在美國文化霸權籠罩之下，我們自行援引（我們所認定的）美國標準來作為互相評鑑的準則，這可能導致盲目追隨西方理論，同時造成投入眾多學術資源研究美國主流議題，以及以美國的視野與問題意識來探討在地議題。

五、小結

後進國家的人文社會科學該如何發展呢？回歸傳統當然是一空洞不存在的選擇，即使傳統若未全失也不可能完全符合現代化社會的需要。我們需要向西方學習早已不是一個問題，而是如何向西方學習，如何從我們的需要出發來進行學習，如何落實在地化的問題。

人文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我們若要是能在這些方面對人類做出貢獻，必然是要奠基在我們對於自己經驗的研究成果上，這是我們的「比較利益」，凸顯我們的特色是我們能真正參與「全球化」的方式。當然更不用說，在地的人文社會科學原本就應該是要服務於在地社會的需要。我們社會其實已經在各方面有長足的進步，應該要努力脫離因缺乏信心而一味依靠西方肯定的階段，我們學術社群也應該脫離因無信心，而一味地依賴絕對化數量化標準的階段。做不到這些，學術在地化也就談不上了。

從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 (一)如何進行學術評鑑？評鑑的標準與制度該為何？我們應對此進行公開討論。
- (二)我們應可歷史性地來看台灣學術的發展。相對於傳統的學閥式的學術生產方式，目前以 SSCI 為標準的方式，確有建立客觀標準、提升學術水準的作用。
- (三)除了上述西方量化標準之外，現應已有條件來建立比較複雜

化的評鑑制度，以進一步提升學術的品質，並建立我們學術的主體性。

(四)當 SSCI 成爲最高標準之後，會產生只著重論文篇數與參與國際能力、一味追隨西方問題意識的問題。

(五)我們在全球學術市場上的比較利益，應在於從對自身經驗研究中得出普世性的理論。目前這套獎懲標準中，對此等工作並沒有提供誘因。若不將自身在全球市場上清楚定位，只是一味追求增加 SCI/SSCI 之論文篇數，對於台灣的「全球競爭力」並無實質助益。

(六)應展開如何設計可提升研究品質的評鑑標準與制度之討論。建議鼓勵多種不同性質的研究工作，讓評鑑標準以及獎勵方式多元化。建議對期刊的品質認定標準設低標於「有無匿名評審制度」，同時應取消量化等級標準以及計點制度。將評鑑工作回歸同儕對於「實質貢獻」的評述。

台灣戰後這幾十年來，經濟成長掛帥，理工遠重於人文。發展至今，這樣的偏差對社會所造成的弊害已經清楚易見，以致於今眾人皆在感嘆社會上人文價值的欠缺。但是，若要重振人文，我們學界自身需要能夠培養有份量有厚度的學者，我們需要有相對應的評鑑制度。很遺憾的是，現在我們人文社會學科的評鑑方法，都亦步亦趨地追隨理工學科的邏輯。若回溯歷史，我們可以找到些現在難以想像的情況。譬如，最近中研院在開院士會議時，在當年（1962 年）胡適擔任中研院院長時，於開院士會議時因心臟病倒下之處蔡元培館懸掛紀念牌。對於習慣於理工重於人文的我們，可能很難想像當年胡適同時領導科學與人文領域？很難想像胡適當年出殯時，台北市萬人空巷？不過，我們現行的只著重 SSCI 篇數的制度，有可能培育出像胡適這樣的學者嗎？

參考書目

- 巫和懋，2001，〈經濟學在台灣的發展〉，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演講。
- 許松根，1994，〈經濟國際期刊的分等級群〉，研討論文，中研院經濟所。
- ，1999，〈經濟國際期刊的分等級群〉，《國科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9: 505-521。
- 曹添旺、賴景昌、張峰嘉，2002，〈台灣經濟學術單位在EconLit資料庫的學術表現〉，《經濟論文》，30(2): 115-152。
- 國科會，1996，〈經濟學學門規劃專題研究〉，國科會。
- Lau, Lawrence J.,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a World-Class Economics Capabilit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中研院經濟所.
- Post-Autistic Economics Network, <http://www.paecon.net/>.